

# “彝海结盟”前，“弄染结盟”同样感天动地

本报记者王丽、李惊亚

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盟”成为一段传世佳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彝海结盟”之前，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彭德怀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的“弄染结盟”，同样感天动地。

是什么原因让布依族首领陆瑞光愿与共产党人共同签订“反蒋协定”？与红军结盟仅600多天，陆瑞光为何英勇就义？这段历史究竟为后人留下了什么？

## 少年英雄踏上戎马生涯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弄染寨原属关岭县六马区，地处镇宁、关岭、紫云三县交界的中心位置。

1901年10月，陆瑞光在弄染寨出生，家境殷实。然而，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动荡年月，再丰厚的家底也敌不过当局如猛虎的苛捐杂税和官差兵丁的无耻抢夺。1919年，陆瑞光的父亲和大哥因参加农民武装暴动罹难，父亲被枪杀于狱中，大哥被枪杀。

这一年，陆瑞光刚满18岁。家庭变故成了他组织武装、拥兵反抗反动当局的导火索，也是他戎马生涯的开始。

陆瑞光少年时期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文化，并跟随大哥练就一身武艺，加上他豪放的性格和仗义疏财的为人，很快就拉起了队伍，最多时达2000余人，成为实际控制弄染方圆几十公里地区的民间武装首领。

据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1921年，六马地区大旱，物价飞涨，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军阀仍然随意巧取豪夺，陆瑞光再也无法忍受，终于打响了抗暴的第一枪，将抢夺百姓财物的军阀兵丁打得落荒而逃。从此，军阀再也不敢进入六马地区欺辱百姓。

光明磊落的陆瑞光，不仅赢得了穷苦百姓的拥护，也赢得了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的尊重，纷纷加入陆瑞光的队伍，一起抗击军阀。

陆瑞光经常亲自带领队伍出入镇宁、关岭、紫云县一带，甚至进入北盘江，到广西、贵州、云南交界处，突袭小股军阀，缴获枪支弹药。1922年，陆瑞光听说紫云百姓受尽当地军阀的欺压，苦不堪言，于是集结了500人的队伍攻打紫云，赶走了军阀。一系列抗击活动，使陆瑞



陆瑞光纪念馆中展现“弄染结盟”的画作。本报记者李惊亚摄

光成为军阀政府的心头大患。

当局决定“改剿为抚”，陆瑞光被委任为保安营营长。陆瑞光以为这是军阀政府对自己的“妥协”，欣然赴任后，却变成了当局“清剿”地方武装势力的“卒子”。

陆瑞光逐渐认识到这是军阀政府的阴谋，只要是反动政权当道，穷苦百姓就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自己也会被无休止地拖入战乱之中。

## “弄染结盟”，陆瑞光帮助红军顺利过境

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诱出滇军驰援贵阳。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红军兵分两路，向西进发。4月中旬，红军进入镇宁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六马一带的是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的红军三军团。

三军团若要成功实施转战云南的战略，必须迅速通过六马地区，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寻

求战机。如能争取到当地首领陆瑞光的支持，不仅能保证红军安全通过六马地区，还能使少数民族同胞免受战乱伤害。

“陆瑞光虽然听说过红军，但因长期遭受贵州军阀的欺压和愚弄，让他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陈莹莹说。据说，红军先遣人员联系陆瑞光时，他躲进了岩洞。几经周折后，彭德怀和杨尚昆决定亲自上山“会一会”这位首领。

顾虑重重的陆瑞光派亲信做替身，自己暗中观察，感觉红军待人和蔼亲切，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凶神恶煞。性格耿直的陆瑞光按捺不住内心的愧疚与兴奋，站出来亮明了身份，将红军热情迎进了家中，杀猪宰羊。

“与红军深谈之后，陆瑞光认识到，这些年来，自己起义的目的和红军的革命理想其实是一致的。虽然陆瑞光谢绝了加入红军的好意，但他表示愿继续在当地与国民党展开斗争。”陈莹莹说。彭德怀、杨尚昆以三军团的名义与陆瑞光签订了反蒋作战协定，陆瑞光还收留了12名红军伤员疗伤，并接受了

红军赠予的36支步枪和一面红旗。

有关史料记载，彭德怀、杨尚昆与陆瑞光签订反蒋作战协定后，于4月16日给中革军委发电报告了此事——

“沙子周(沟)百数十里，有夷(即布依族)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员。”

红军离开弄染寨时，陆瑞光送出很远才返回。最终，红三军团顺利通过六马地区，渡过北盘江，向西南方向疾进。

红军留下的指战员方武先等工作人员帮助陆瑞光壮大了队伍力量，他们共同开创了镇(宁)、关(岭)、紫(云)三县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抗捐、抗粮、抗兵”和“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活动。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华认为，这次结盟反蒋，是陆瑞光从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首领向一个革命者转变的分水岭，为红军速渡北盘江挺进昆明抢渡金沙江赢得了胜利战机。这一事件后来被党史专家认定为红军途经民族地区成功实施“争取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事件之一。

## 36岁牺牲，却播下“星星之火”

红军大部队离开后，陆瑞光与方武先公开建立了镇、关、紫三县边区人民抗捐委员会革命政权，坚持武装斗争，强烈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当局不断派兵来骚扰、攻打陆瑞光等人，一些红军伤病员先后被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陆瑞光与方武先决定率队伍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投奔红七军，但中途受阻，只能退回弄染。

此后，陆瑞光、方武先通过党内渠道在安顺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这也使国民党决心铲除陆瑞光。1936年12月26日，国民党来弄染寨诱捕陆瑞光，激战中，双方伤亡惨重，陆瑞光被捕。方武先和住在陆瑞光家中的红军在这场战斗后一直下落不明，有分析认为，他们均壮烈牺牲。

现年85岁、居住在镇宁县城的陆兴榜是陆瑞光最小的儿子。在他的家中，挂着一

张父亲的黑白照片，照片中，陆瑞光一身的布依族男子装扮和一副视死如归的面容。

“我父亲被捕后，预感到凶多吉少，来日无多，关押在紫云期间，他向当局提出了照相的要求，说想给家人留个纪念。但当时紫云没有照相馆，家里人便从安顺请来照相师给他留下一生中唯一一张照片。”陆兴榜说，此后，陆瑞光先被押解到安顺，游街示众几天后收监关押至省城贵阳。

1937年初，陆瑞光在贵阳英勇就义，时年36岁。陆瑞光遇害后，家里辗转托人将他的遗骸从贵阳取回，安葬在弄染寨。

敌人抓走陆瑞光的同时，血洗了弄染寨，幸存的村民纷纷外逃，过去繁华富庶的寨子，一时间空空荡荡。尚在襁褓中的陆兴榜被母亲带回关岭娘家，在山洞里东躲西藏。由于害怕被发现，平时连烧火煮饭都不敢，靠亲戚送饭吃。1948年，12岁的陆兴榜才重回弄染寨。

陆瑞光虽然牺牲了，但是红军在布依族山寨、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镇宁县史志办主任陈廷才说，1947年底至1949年，在六马地区活跃着一支党领导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其中的很多成员都是原陆瑞光武装力量的骨干和红军过镇宁时留下的人员。1949年10月，中共罗盘地委决定，将六马游击队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西南。

据镇宁县党史部门的资料，这支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牵制和打击敌人、截击国民党溃兵、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滇黔公路畅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围剿土匪、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方面立下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陆瑞光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参军入伍，二儿子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为一名铁道兵。小儿子陆兴榜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供销社工作，在民办学校当教师，后来回老家务农。

198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为革命烈士。2015年，位于镇宁县城的陆瑞光纪念馆开馆，如今已成为贵州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共有超过6万人次的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这位忠肝义胆的少数民族首领。

# 从“红船”到“红城”，“石榴籽”是这样抱起来的

本报记者丁铭、达日罕

1921年，在嘉兴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救亡图存之路。1947年，在“红城”乌兰浩特，党的民族政策生根发芽，结出新的果实。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历经从“红船”到“红城”的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了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中华大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 红船——引领中华民族扬起救亡图存风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在纲领中注明“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中共二大宣言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也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追求独立求解放的征程中，少数民族的身影从未缺席。邓恩铭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他是来自贵州省荔波县的水族，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会。据目前资料所知，在当时全国早期党员中，除邓恩铭外，少数民族党员代表还有瑶族的何孟雄、李启汉，以及回族的刘清扬等。

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蒙古族，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指引下，较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入到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征程中。

在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深处，一座雕梁画栋的古老京式院落藏匿于众多现代建筑中，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旧址——蒙藏学校。这所建于1913年的学校，是在北京创办的全国第一所民族学校，同时也孕育了蒙古族革命的火种。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乌兰夫纪念馆，向人们展示了这段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等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并加入“马



在乌兰浩特市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中，展示着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发布的相关文件。本报记者达日罕摄

## 红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探索

1923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内蒙古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青年之一。之后荣耀先回到内蒙古地区，动员云泽(乌兰夫)、吉雅泰、多松年等41名蒙古族有志青年，奔赴北京蒙藏学校学习。

此后，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共北方区委的10多位共产党员多次前往蒙藏学校，带来了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刊物《新青年》。30多位蒙古族青年学生围着火炉，倾听李大钊的宣教，真理的种子就这样根植在他们心中。

乌兰夫纪念馆至今还展示着一本珍贵的刊物——《蒙古农民》。这是1925年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下，乌兰夫和多松年等人创办的刊物，它向广大蒙古族民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这批年轻的共产党员经过锻炼，成长为内蒙古革命的骨干力量。蒙藏学校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少数民族中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 红城——诞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样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长征中虽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但党对民族问题却极为重视，针对长征中要穿越黔、滇、康、川等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区，中央红军政治部在长征刚开始就发布了针对瑶民和苗民的工作指示。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到达彝族地区时，毛泽东嘱咐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带着毛泽东的嘱咐，红军始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最终成就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盟”佳话。

随着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创建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也转移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在此进行了民族自治实践。年近古稀的刘煜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他介绍，《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陕甘宁边区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明确了“依据民族平等原

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建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1936年陕甘宁边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府。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此完成了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近三分之一的篇章，对当时的自治实践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杨文元是同心县党史研究专家，他说：“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署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杨文元表示，正是有了毛主席指示，有了顶层设计，有了中共陕甘宁省委和西征红军党委的具体落实，才有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5个回民自治区和1个蒙民自治区，5个回民自治区建立在汉回杂居的地区，城川蒙民自治区是唯一建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民族自治试验区。

“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上日渐成熟。”杨文元说。

## 红城——诞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样板

李思宇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内蒙古解放纪念馆的讲解员，一身深红色制服，与她身处的红色纪念馆十分协调。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五一大会”，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段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针对内蒙古提出了发动地方自治运动、实行区域自治的工作方针，领导开展了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

李思宇说，当时内蒙古面临的形势很复杂：一是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后继续对内蒙古采取各省分割统治的办法，试图撤销内蒙古这一历史名称；二是在锡林郭勒地区有日伪残余势力组建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三是东部地区还存在不了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这种情况下，内蒙古的统一刻不容缓。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乌兰夫回到内蒙古

工作，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于1947年在乌兰浩特召开了由内蒙古各地方代表参加的“五一大会”，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乌兰浩特是蒙古语“红城”的意思。如今的乌兰浩特市，“五一大会”旧址还保持着1947年内蒙古各族代表前来参加会议时的样子：坐东朝西的礼堂，门前挂有内蒙古自治政府旗，厅内挂有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致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毛泽东、朱德给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贺电》，以及乌兰夫等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的大幅彩色油画像……

对原内蒙古骑兵第一师警卫团战士乌力吉图来说，为“五一大会”警戒好像还是不久前的事。已是耄耋之年的乌力吉图，回忆起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过往，依然声如洪钟，目光如炬。“自治政府成立前，乌兰夫同志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各民族统一到一条战线上，为内蒙古统一自治打下了基础。”

兴安盟档案史志馆副主任那顺乌力塔说：“内蒙古自治政府使蒙古族群众得到了有史以来不曾得到过的当家做主的权利，增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也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成熟阶段。”

那顺乌力塔认为，党的民族政策从开始时的“自决”过渡到之后的“自治”，并在“红城”乌兰浩特实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一方面结束了内蒙古60多年来被分割统治的局面，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是内蒙古各界、各阶层人民都参与进来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民族实际问题相结合，找到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方针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发展道路，也为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提供了样板。

此后，新疆、广西、宁夏和西藏几个省级自治区相继建立，目前我国共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还有1000多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